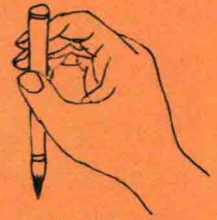


中国书法



日
不
此
將
空
海
女
子

夏商周时期

中国书法的起源

中国文字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发展至商朝产生甲骨文，书风浑朴古拙。商末周初，金文出现在青铜器物上，金文是比甲骨文更成熟的文字。从西周到战国，越往后字形越趋向规整划一，结构也趋于定型，更具书法美。金文反映的内容更宽更广，极富现实气息。先秦最有名的石刻文字则是石鼓文。石鼓文属篆籀系统，布局匀称，结字严密，为大篆到小篆变化的过渡形态。

闻名中外的甲骨文

发现与研究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因病在药物“龙骨”上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化价值。

先秦时代的人习惯占卜，专职的贞人可以从龟甲或兽骨的裂纹上判定吉凶，然后记录在甲骨上。这种占卜的记录，也叫卜辞，因为是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便成了甲骨文。

甲骨文多见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人不管多大的事，都要占卜，如祭祀、征伐、田猎、年成、疾病、旅行、天气、生娩等各个方面，都要先求神鬼天命。甲骨文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所以它也叫占卜文字、甲骨卜辞、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殷墟文字、殷契。

1933年，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按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方法、字形、书体等十



↑ 刻辞卜骨 / 商
牛骨，河南省安阳市
殷墟出土（传），英国伦敦
市大英博物馆藏。

个标准，将甲骨文分期为五个时期。这些标准中，与研究书法有关的包括：贞人，即书家；字形，即文字点画结构；以及书体，也就是书法体势和风格。

甲骨文一般是刀刻的，或刻好后填朱，个别是用朱、墨所写而未刻。也就是说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或者先写后刻。甲骨文线条刚劲有力，有直线、曲线；单刀，或者双刀。往往是中粗端尖，点画起止仍用方圆方法，直画中略有曲意，线条点画丰富多彩。字形为长方，以对称、横竖、斜角线条居多，方圆曲直线条组合意味深长。

特征及风格

甲骨文的句子构成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差异不大，包括主、谓、宾，还有修饰语。《说文解字》中提出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就有体现。它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者属文字的构造规律，后两者则是文字的使用方法。

甲骨文的艺术风格分期，总结为五个时期：第一是商王盘庚至武丁时期，风格最为突出，也最为精细。

武丁是商诸王中最杰出的帝王，执政时国势旺盛。那时的甲骨文字契刻有力，手法粗放刚峻，大字雄浑粗犷，小字端庄俊秀。

结构和布局

甲骨刻辞，有的是契刻者先把



↑ 刻辞卜骨 / 商

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刻辞卜甲 / 商

牛甲，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字中的横竖笔画分类，再旋转骨片契刻，即先刻文辞中所有字的竖画，再旋转骨片 90 度，原来的横画也按上面的方法刻。武丁时的卜辞为了突出美观，刻完后，再涂上朱或黑色。这种契刻方法规范了甲骨文字的横竖笔画，也促使汉字慢慢形成方块布局。甲骨文中许多篇章的字与字、行与行的布局上都有大处着眼、构思缜密的特点。有横看成行，纵看成列的感觉，就像军阵，方正严谨，如《殷契卜辞》第 165 片的干支表。还有纵无行、横无列的，纵横交错，浑然一体。

高古的商周金文

金文的发现与研究

金文是先秦时期铸刻于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古代称铜为金，于是青铜器铭文叫做“金文”或“吉金”。

西汉时就有青铜器出土，但发现和研究在北宋时才稍有成就。金文的研究兴盛于清代。近代学者对金文的研究更是集前代之大成。如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 卷，集中了所有可见的古今铜器铭文、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在判定铜器分期、考释文字、研究古文字方面十分重要。

商代青铜器金文

最早的金文是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族徽符号。一般铸于铜器腹内或颈部、底部，个别在肩处，最多铭文有数十字。

学术界将商周金文也分成 5 个时期：依次为商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商代又包括两类，一是铸有文字的铜器，发现于商代中晚期；一是“图形文字”，是不可识的，多见于西周早、中期。容庚《金文编》附录里记有 562 种。

商代有铭文的青铜器少但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铭和后母辛鼎铭就是王室重器上的铭刻，字的气势雄浑、磅礴。

发达的西周金文

西周是金文最为发达的时代。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上比商代多，而且铭文较长。西周金文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多以族徽为多，字少有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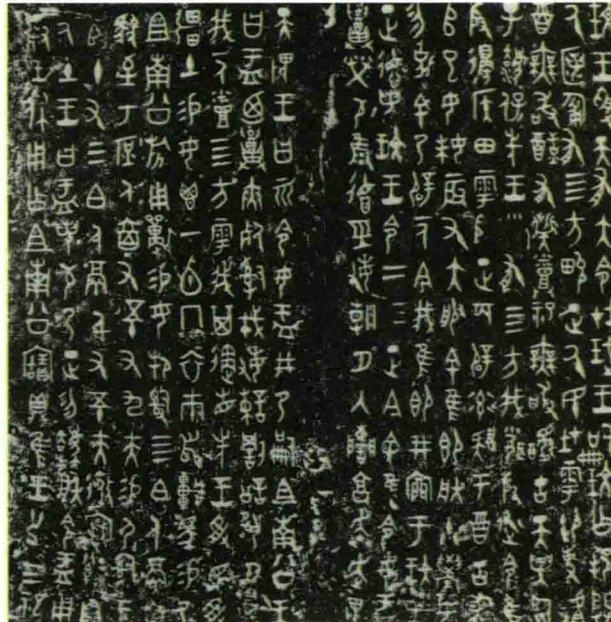
↑ 后母戊方鼎铭文 / 商
青铜，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出土。



↑ 亚字方罍铭文 / 商
前 14—前 11 世纪，
青铜，上海市博物馆藏。



↑ 天亡簋铭文 / 西周
青铜，陕西岐山出土。



↑ 大孟鼎铭文 / 西周
青铜，陕西眉县礼村出土。

磬，犹有商代遗风，但已有章法布局。中期相当于穆、恭、懿、孝四世，笔画均平，布局完整，端庄质朴。晚期书法风格多样，各显风尚。

《天亡簋》，是西周武王时期所作，铭文 8 行，76 字，其书凝练平直，笔画方圆兼备，大小相同，气韵流动于字里行间，金文本身圆浑凝重的特点已非常明显。

《大孟鼎》，是西周康王时的作品，它是现存西周最大的鼎，腹内铭文 19 行，291 字，字形长方，笔势圆润，字态生动，平静中又有变化，字距、行距布置精巧，端庄典雅。

《虢季子白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有 8 行，共 111 个字。记述虢季子受周王之命征伐狫狁，因功受赏。其章法与以往不同，极其疏朗、恬淡。

《散氏盘》，为西周厉王时的作品，在乾隆年间出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 19 行，共 375 字。此书横势强，字形圆转，八面取势，其一点一画都好像是“颤笔”，直曲相间，韵味十足，有如字体腾空起舞，字字珠玑，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

《毛公鼎》，为西周厉王时的作品，铭文 32 行，共 497 个字，铭文最长，意气风发，其书亦雄阔浑沦，大有磅礴之势。

春秋战国金文的时代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地青铜器铭文极具地方色彩。风行把金丝镶

石鼓文与战国盟书

周原石鼓文

石鼓文是东周最重要的石刻文字，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声名显赫，被人称为“石刻之祖”。唐初在陕西省凤翔县三原发现《石鼓文》。文体是四言诗，由于记载的是秦国君主打猎的情景，所以它也叫《岐阳石鼓》《陈仓十碣》《猎碣》。

石鼓文的制造年代，人们最初都认为是西周宣王时代才有。唐朝窦臯的《述书赋》中认为它是周宣王时期的物品。近代学者认为石鼓文是先秦的石刻，但关于其具体年代学者们的看法各不相同。

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石鼓文》现今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全文共有654个字。可现在在第八鼓上却字迹全无，九只鼓仅存有三百来个字。

石鼓文字体呈方形，略有点竖长，字形上边紧而下边较松，布局稀疏，笔画均匀，圆转有力，它摒弃了在青铜器造型上用商、周金文作装饰的传统，形成单独的本体，把后世书法对笔意的自然、对书写的流利和韵律的追求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石鼓文》书法在唐初就被“虞、褚、欧阳共称古妙”。从书法角度上看，《石鼓文》继承《秦公簋》法乳，却更趋向于方整丰厚。《石鼓文》无论是在起笔还是落笔上都为藏锋，字体圆润有力，结体促长伸短，均匀适中，在平整中呈现欲擒故纵、稳实中求错落之态；再加上整体的章法整齐平实，使这种书法既朴素平和，又古茂雄秀，被称为古今之一绝。而且《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它有很高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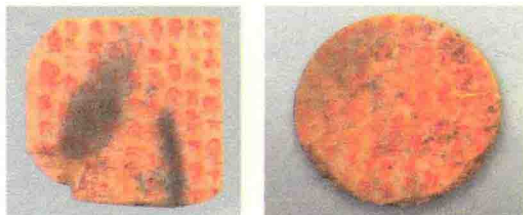


↑ 石鼓文 / 战国

纸本墨拓，陕西凤翔三原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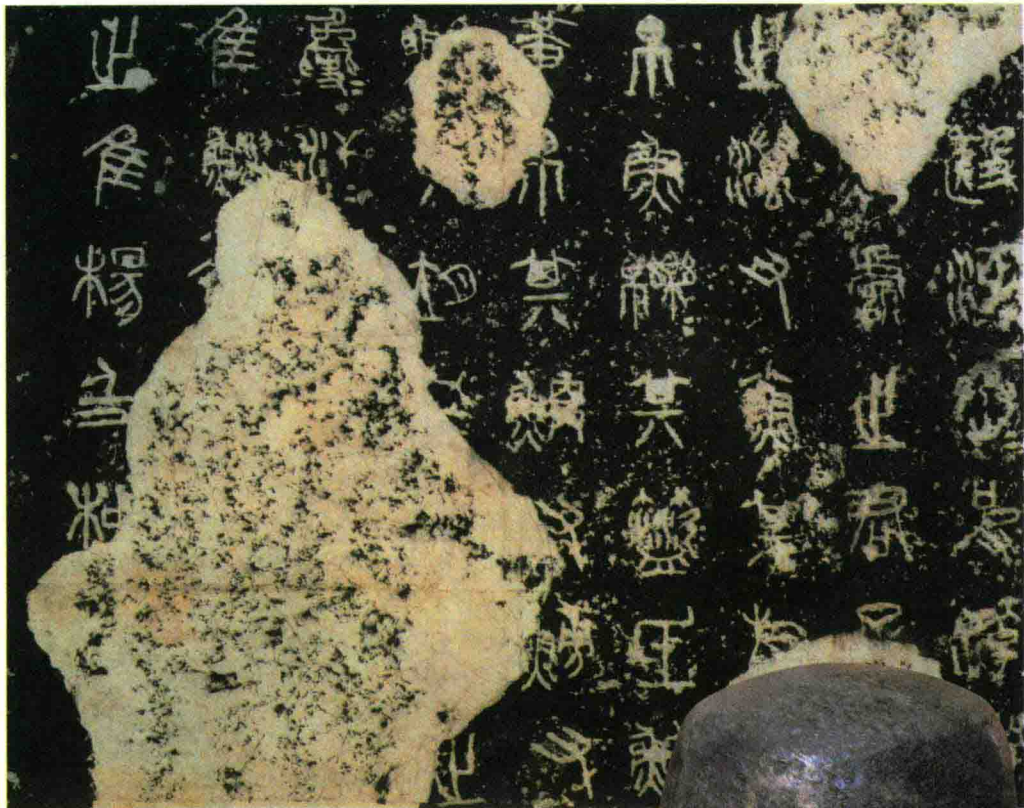
战国盟书

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结盟订誓时所记下的盟辞，叫做盟书或战书。《周礼·秋官·司盟》记载：“掌盟载之法。”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斫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



↑ 侯马盟书 / 春秋

黄玉，山西侯马出土。



↑ 石鼓文 / 战国

陕西凤翔三原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谓之载书。”

出土的盟书全是三家分晋前由晋国遗留下来的。

主要发现于河南、山西两地。从 1942 年开始，河南沁阳、温县一带，发现了很多盟书，共有 500 多片，都是用墨书写在青石片上。

1965 年，在山西省侯马市东的春秋末期晋国遗址中发现了侯马盟书，共有 5000 多片，有 656 件保存完好，并且字迹清晰。在玉片和石片上是用毛笔写的盟书誓辞，以朱红色为主，墨色为辅。形状呈圭形，上尖下平，还有的是长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大的有 32 厘米长，4 厘米宽。小的有 18 厘米长，但宽不足 2 厘米。侯马盟书分为“宗盟”“委质”“反纳室”几类，也有的分为“诅咒”“卜筮”等类。其字数有多有少，最多的一片有 220 字，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秦汉时期

隶书的黄金时代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的小篆成为秦代的官方通行文字，李斯对这一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民间则流行隶书。汉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型的重要阶段，篆、隶、草三体并行。篆书主要用于刻石、刻符和官方文书；隶书多用于地方官吏文书和经典的书写以及墓碑；草书则供民间日常书写使用。汉代晚期出现了张芝、蔡邕、刘德升等名家。

李斯与秦朝小篆



↑ 李斯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和大臣制定“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的三同政策。所谓“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文字字体。战国时各地“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秦始皇认识到这种局面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大力改革文字，力图以秦国文字为标准，下令让丞相李斯将秦国地区原来通行的以籀文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如石鼓文、诅楚文等加以简化或保留，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小篆”的官方使用的统一标准文字“秦篆”。

从整体上来说，秦文化是在继承、发扬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春秋后期的《秦公钟》《秦公簋》，在文字的结构和风格上都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的痕迹。发展到战国时期的籀文体系，字形、偏旁等开始定型。政治上的强制手段只是加快了大篆向小篆转变的进程。

李斯的作品《仓颉篇》、赵高的作品《历篇》和胡毋敬的作品《博学篇》对当时统一文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在这三部作品早已不复存在，对于真实的秦篆，我们今天只能从李斯书写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的遗迹中揣摩到。



↑ 泰山刻石 / 秦

李斯(?—前208)，字通古，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他是荀卿的学生，发迹于秦国，任客卿、廷尉，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被委以丞相重任。后来遭赵高诬陷，在咸阳被腰斩。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

李斯除刻有《泰山刻石》与《琅琊台刻石》外，还有多幅作品，但保留下来的其他诸刻都不是他本人的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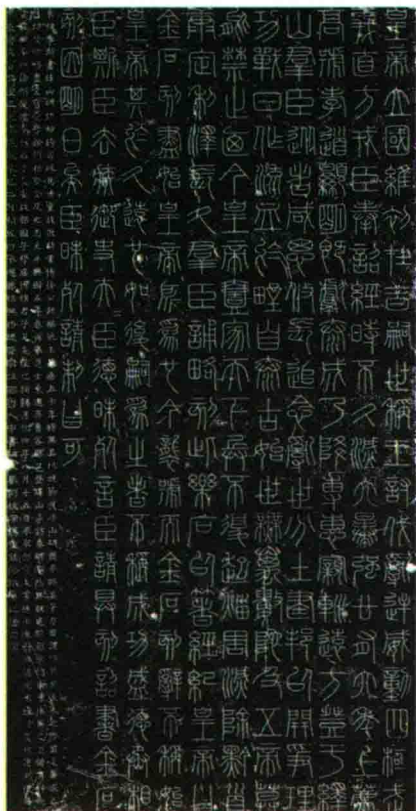
《碣石》为清乾嘉年间重刻而成，《会稽》由元人重刻，这些翻刻的作品已找不到原作的风采，只是徒有其表。《之罘》《东观》现只见于记录，实物已失。流传最广的只有《峰山刻石》。

相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峰山，将此碑推倒。后碑被灭毁。杜甫诗云：“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由此知此碑在唐朝已不存在。

长安、绍兴、浦江、应天、蜀中、邹城等均有峰山翻刻品，其中的精品为郑文宝长安摹本。



↑ 琅琊台刻石 / 秦



→ 峰山刻石 / 秦

前面提到的碑刻最能表现秦篆的特点：圆润饱满的线条均匀严整，用这种线条构成的文字字形平正而威严，通篇连牍的此类文字易产生茂密而有气势的效果。从中可以感受到大一统的秦王朝的凛然气概，秦篆成为秦朝官方文字是一种必然趋势。用笔干净利落瘦挺，提笔一点而过，圆融峻整。这种仙人玉箸钗股的笔法写出的字又称为“玉箸篆”。清桂馥说：“小篆于籀文多减，于古文则多增。”与《石鼓文》《秦公簋》相比，秦刻石较为简单。

五彩缤纷的汉代隶书

西汉初年在文化上沿用秦制，书法和秦代很相似。

西汉石刻以《五凤刻石》和《莱子侯刻石》为代表作。《五凤》中两个“年”字竖画长写，得横势，笔法质朴圆浑。《莱子侯》笔势近方，字形偏平，取纵势，朴中有妍，汉碑章法中行距小于字距的法规由此而得。均行距大，出于竹木简的分割启发，几条直线也极有趣味，实是后来乌丝栏的滥觞。

东汉“碑碣云起”，是由于那个时候大家族的门生故吏很多，常常向府里的主人歌功颂德。

清代朱彝尊在《跋汉华山碑》中将汉隶分成了三种风格：方整，流丽，奇古。其实汉碑从形状的制作上可分为碑刻与摩崖两大类。从笔法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方笔为主；第二类以圆笔为主；第三类方笔与圆笔皆有，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乙瑛碑》刻于桓帝永兴元年（153），碑书工整壮观，端庄秀气，温柔醇厚，既有方笔也有圆笔，圆滑美丽，苍峻潇洒，波磔十分鲜明。翁方纲说：“是碑骨肉匀适而情文流利，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礼器碑》刻于桓帝永寿二年（156），碑书苍劲有力，古茂渊雅，庄重中透露出秀丽洒脱的气息。笔法瘦硬而强健，波磔挑笔其提按的幅度非常大。王澐认为“瘦劲如铁，变化如龙”。郭宗昌《金石史》说：“（礼器碑）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



↑ 五凤刻石 / 西汉

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

《孔宙碑》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用笔舒展，锋长意浓，带有抒情意味，最为醇美。

《华山庙碑》刻于延熹八年(165)。此碑清人非常推崇，朱彝尊“披览再三，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其书气度典雅，温柔醇和，用笔俯仰有致，方笔圆笔都有；横磔波挑，曲折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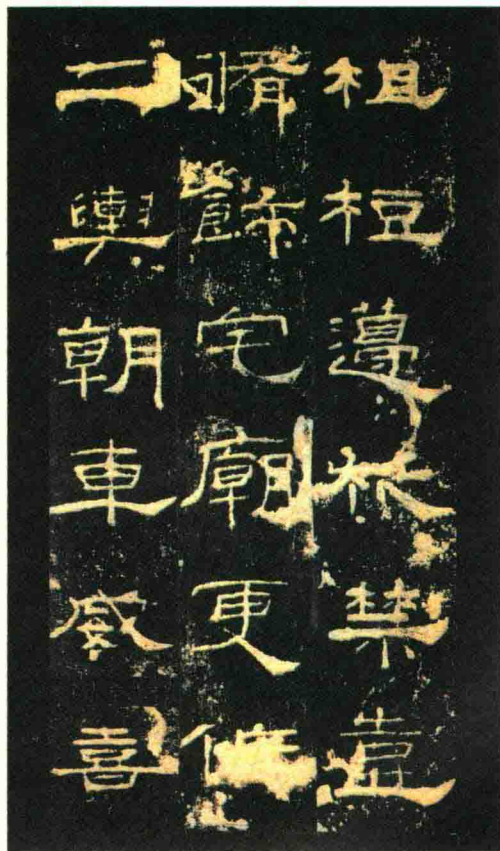
《衡方碑》刻于灵帝建宁元年(168)，阳文采用隶书，端正浑厚，沉着有力。万经评价这块石碑：“笔画粗硬，转掉重浊，则石理太粗，刻手不工之故耳。细玩之，其遒劲灵秀之致，固在也。”

《史晨碑》刻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书风峻峭，端正严谨，然又风神流宕。前后碑方圆兼备，刚柔适度，结构平整，法意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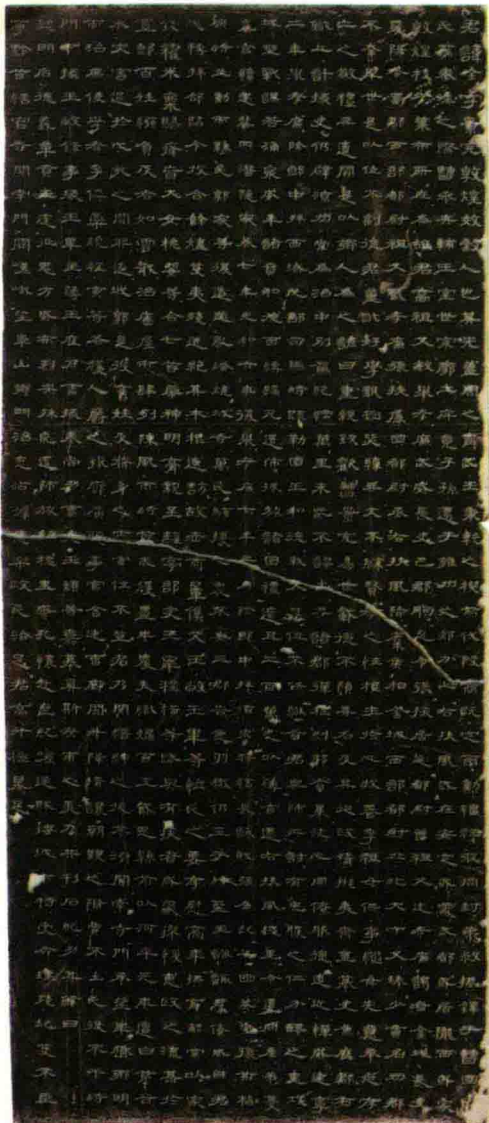
《夏承碑》刻于建宁三年六月(170)。笔画行以篆法，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是汉碑中的变格。王澐说：“此碑字特奇丽，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隶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使不免堕入恶道。”



↑ 张迁碑 / 东汉



↑ 礼器碑 / 东汉



↑ 曹全碑 / 东汉

一大关键。”

刑徒墓砖是随着死去的犯人一起埋葬的墓砖。它的上面主要用来刻记死者的籍贯、名字、死期等。它的目的是为了区别死者的个体，不具备带赞颂性质的墓志。1964年在洛阳南郊发掘了522座刑徒墓，出土了820多块墓砖。其中的229块刻有文字。文字所涉及的时间是从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到延光四年（125）。刑徒砖的刻写有的是先用朱笔书写然后用刀根据笔画进行雕刻，有的则是直接刻出。刻写者运刀的急缓顿挫、轻重提按等“笔”味，以及每一根线条之上凝结的那种匆匆的刻画风格，比碑刻更具有“写”的味道。

《张迁碑》全名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笔力雄厚、苍劲朴拙，其横直的起笔收笔的矩形状，不单表现了刀刻的特色，线条的峻利效果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波磔之笔多表现含蓄、厚重，这又使它的线条骨力显得内敛。方形的结体使字的重心有所降低，成为峻利与内敛相一致的线条的依凭与归宿。字距行距差不多是一样的，而又通过字的大小及横行字的参差造成整篇朴厚古典的意境。

《曹全碑》以中锋运笔，并在起笔和收笔时藏头护尾，因此，其线条丰腴蕴藉、柔和圆润；而其长横、长捺等笔画，波磔分明，使笔意得到了自由的宣发。它的结字体态绰约、平正端庄，它字体形态的扁平和中宫的紧缩又使它在平稳中见流动。整篇文字清新秀逸、妍媚婉约，使人联想起少女翩翩起舞、春风拂柳等自然的美态。孙承泽评价《曹全碑》说：“字法道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价这些字很“秀韵”。清方朔谓此碑：“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家

摩崖石刻是刻在悬崖陡壁上记录功绩的文字。由于崖壁的凹凸不平，因此刻字就要根据它的山势进行布局，从而使这种刻字在章法上参差错落而又有一种天然形成的意趣，在线条的处理上注意把握大的效果而不是精细的雕琢。

《褒斜道》刻于永平九年(56)，用篆书笔法，无委婉曲折之形态。吴昌硕跋云：“褒斜道石刻，字界篆隶之间。宋绍熙南郑令晏袤尝跋此刻，笔法奇劲，古意有余，盖当时开通工竟，记其事者命工人泐诸崖石，信手刻凿，故无所谓分隶右篆也。”

《石门颂》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笔法豪放，顺着石壁表面高低不平而曲折有致，形成了摩崖石刻所独有的苍劲质朴的点画趣味。人称其点画为长枪大戟，纵横飞动。此碑以篆籀笔法参以隶书，转折波挑的笔势，好比是天马行空，气象特别开阔。此碑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每行字疏密不同，二是“命”字竖笔的长度比一两个字的长度还长，翁方纲认为是石势、石理剥落开裂，不是“隶法”也。得此结论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竹木简的缘故。

《西狭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工整雄伟。虽是摩崖石刻，然而好似有界格，像刻在碑上，不以波磔呈妍，尤以气韵胜。篆书的结构在不少字中都都有所体现，行气整肃。

《杨淮表纪》刻于熹平二年(173)，在陕西褒城石门西壁上。其书笔法体势很接近《石门颂》，参差秀丽。《广艺舟双楫》说：“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



↑ 刑徒墓砖 / 东汉



↑ 石门颂 / 东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书法的巅峰时期

魏晋时期，官方文体仍沿用东汉正统隶书字体，风格方正平直，有古板之迹，同时民间文书已呈迅猛发展的趋势，草书相当普遍，出现了如钟繇、皇象等首批书法家，随后又有卫恒、索靖、陆机等书家的涌现。他们对推动字体和书风的向前演化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南北朝时期，南朝书体疏放精妙，长于简牍，代表人物有羲献父子；北朝则石刻文字居多，笔画粗重，人称“魏碑体”。

“书圣”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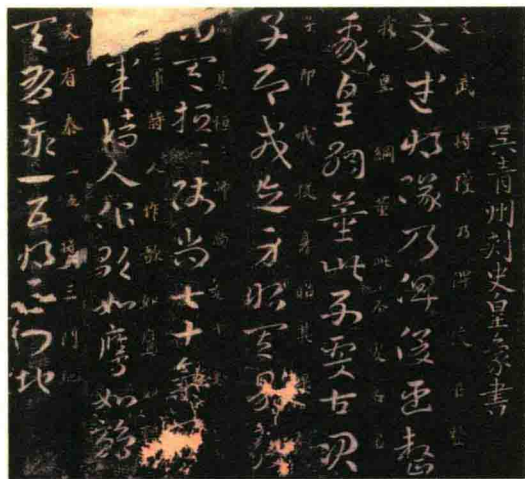
三国时期的书法家层出不穷，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皇象等都是当时书界名人。三国时期在书法上造诣最深，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书法家要数皇象和钟繇。

皇象，出生年月不详，江苏扬州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他对篆隶章草极为精通，时人称为“书圣”。当时人们把他的书法与严武的棋、曹不兴的画等并称为“八绝”。

《天发神讖碑》立于吴天玺元年(276)，立在江苏江宁岩山，又称为《天玺纪功颂》。碑文是皇象所书，字体非篆体也非隶，下笔基本上呈方棱形状，收笔多作尖形，转折之处时圆时方，



↑ 天发神讖碑 / 三国·吴



↑ 文武帖 / 三国·吴

皇象，纸本墨拓(宋·绛帖)，国家图书馆藏。

字体气势宏伟，显示出作者书法创作的另类意境。另有松江本《急就章》及《文武帖》流传于世。正像《述书赋》中所写的那样，广陵之都的皇象字迹朴质古情，人们模仿时很难达到他那种境界。他的字体像龙虬盘延，苍劲有力。

正书之祖钟繇



↑ 钟繇像

钟繇（151—230）是河南长葛人，字元常。汉献帝时举孝廉，曾担任过侍中、尚书仆射，后被封为东亭武侯。魏初迁相，魏明帝时进太傅，后人便称他为“钟太傅”。

史书中传说钟繇对当时的三种字体都非常精通，但他最擅长的是楷书。《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为后人摹刻，但仍能体现钟书的风貌。

《宣示表》是钟繇楷书的代表作。相传晋王导得到《宣示表》后，将《宣示表》缝藏在衣带之中带到江南，并将其送给侄子王羲之，王羲之又传给王修。后来这幅字作为陪葬品与王修一起被埋入棺内。现在的《宣示表》是王羲之临摹的，起初被刻入《淳化阁帖》，后来又被刻入《大观帖》《东书堂帖》《停云馆帖》等。

《贺捷表》又叫做《戎路表》，最后一段为“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南蕃武亭侯臣繇上”，记述蜀国名将关羽被擒杀的整个过程。《宣和书谱》曾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书法从容自如，笔法坚厚有气势。

《荐季直表》是在黄初二年（221）完成的，帖为小楷写成，共有十九行。其“民”字少笔画，也许是唐人拓本。陆行直跋说：“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袁泰亦称赞：“其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盖其楷法去古未远，纯是隶体，非若后人妍媚纤巧之态也。”



↑ 宣示表 / 三国·魏 钟繇

钟繇书法的艺术特点有三点：一是保留了隶书的笔风，体势偏古；二是天然质朴，无刻意勾画之处，浑然天成，是刻意求工的书家无法比拟的；三是字的结构

《清河书画舫》中又记载此帖在清朝时被冯铨收藏，后来又落入梁清标、安岐手中，后又收藏于乾隆内府，后被乾隆赐给了成亲王。民国时它又先后被溥心畲、张伯驹收藏，张氏于1965年将此帖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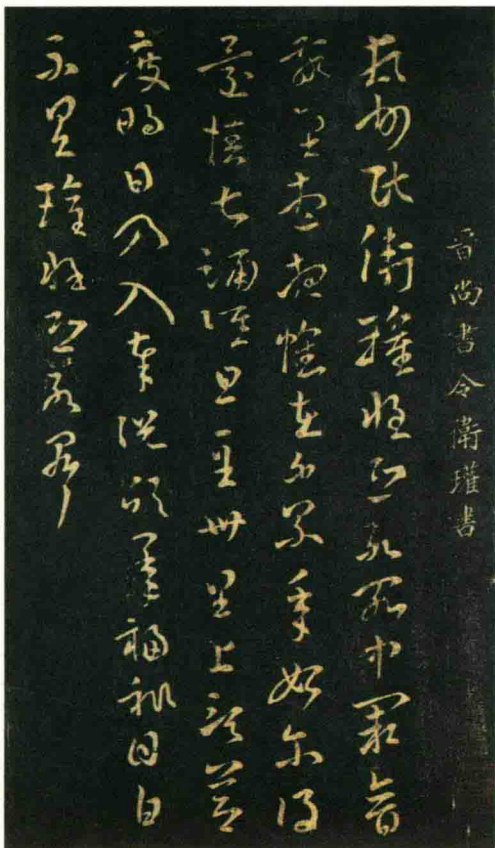
西晋二妙——卫瓘和索靖

卫瓘（220—291），字伯玉，山西夏县人。卫瓘的章草，在皇象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又比皇象书技高，甚至可以与被成为“草圣”的张芝媲美。他与索靖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二妙”，《书断》中如此记载：“时议谓：伯玉放手流便过索靖，而法则不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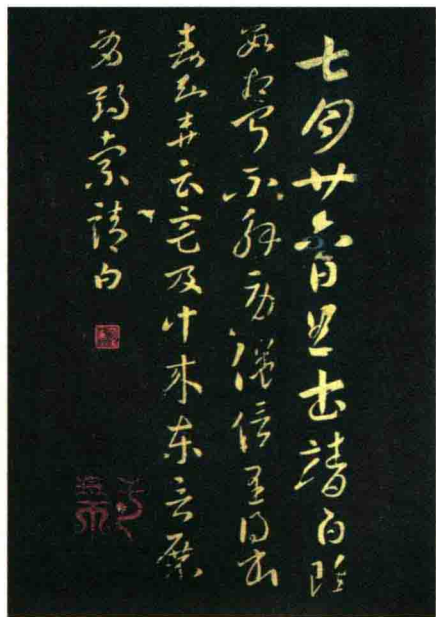
卫瓘的《顿首州民帖》，被《淳化阁帖》《大观帖》先后收录，大约是他留存于世的唯一书迹。此帖字体流畅妍美，但仍保留着章草格局。

卫瓘女儿卫铄，字茂漪，时人都称她为卫夫人。她师业于钟繇，王羲之曾拜她为师。《淳化阁帖》中有她的传世楷书墨迹。

索靖（239—303），字幼安，甘肃敦煌人。索靖是大书法家张芝的亲戚，曾历任尚书郎、雁门和酒泉太守，后拜左卫将军，于晋惠帝六年在洛阳保卫战中战死。



↑ 顿首州民帖 / 西晋 卫瓘



↑ 七月帖 / 西晋 索靖

索靖对章草、八分极为精通，甚至可与卫瓘相媲美。《宣和书谱》对索靖的介绍颇为有趣：“（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未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淳化阁帖》收录有其章草《七月帖》《月仪帖》《出师颂》《急就章》等。



↑ 王羲之像

千古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山东临沂人。王羲之历任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和王会稽。

传说王羲之爱鹅，他为山阴道士写《道德经》，山阴道士最后以群鹅送他，还传说他以一百钱为代价为蕺山老姥在扇上题字，等等。

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据说唐太宗收有 3600 帖王羲之的书法。褚遂良编的《右军书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共有 465 帖。宋朝时《宣和书谱》记载，内府所藏有 243 种。王羲之书法有二十多件墨迹留存于世。

《快雪时晴帖》为素笺，有七寸一分高，宽四寸六分，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人们传说是王羲之的真迹，被清高宗弘历视为“三希”之首，实际上这本素笺为旧摹素笺墨迹本。

此帖所用书法为行草，共 4 行，有 28 个字。书势端庄，运笔流畅，神完意足。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均为行书，三帖均为行书，书风各有特色，沉静秀雅、姿态多变。

《姨母帖》《初月帖》现在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这两本帖是唐代武则天时所刻《万岁通天帖》中的第一、二帖。



↑ 羲之书扇画图 / (日) 如拙